

颠覆及颠覆之后*

——王朔小说再议

柳应明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3)

摘要:王朔的小说以颠覆为能事,它们颠覆了爱情、秩序以及一切传统的价值规范。这种颠覆有一定的警世意义,而其所依据的仍是中国传统的“痞”文化,因此,“痞子”最后只能重归传统。对这种荒诞人生状况的思考,才是王朔小说的最大价值。

关键词:王朔小说;颠覆;反爱情;反秩序;重归传统

中图分类号:J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X(2004)01-0051-05

持续了十多年的“王朔热”终于冷寂了下来,这其间对王朔作品的评论真可谓车载斗量,其观点也是见仁见智:有的称之为“痞子文学”,并与流氓文化相联系;有的则看到其后人道主义;还有的论者则阐释了其现代性……林林总总,而又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论者都认为王朔小说反叛一切,嘲弄一切,否定一切,也就是颠覆了一切。但具体颠覆了哪些?颠覆之后又向何处去?这些好像还鲜有人加以细论。因此笔者在本文中拟以王朔的代表性作品为例就此发表点浅见,以就正于方家学者。笔者以为,王朔的颠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纯情表面下的反爱情,个性解放旗号下的反秩序,由讨厌知识分子走向全面颠覆。这种颠覆有一定的警世意义,而其所依据的仍是中国传统的“痞”文化,因此,“痞子”最后只能重归传统。

一、纯情表面下的反爱情

有人说“痞”和“纯情”是“王朔作品的两极”,并说这“痞”并非真痞,而是“性本善”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质是“性本纯情”。这种纯情又是通过爱情来表现的,所以在爱情中痞子和少女都是纯情的。^[1]笔者以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不错,王朔是以言情小说走上文坛的,他的成名作《空中小姐》曾令无数少男少女感慨唏嘘,泪雨滂沱;王朔也因

此被称为“男性琼瑶”。但细读之,《空中小姐》在本质上实是个最无情的故事。女主人公阿眉是一个纯情少女,而男主人公“我”则是一位成年人,两人对生活、对爱情的态度均大相径庭,阿眉碰到“我”注定要倒霉。“我”在阿眉和读者的心目中原本是一个英雄,因此令阿眉深深地陷进英雄崇拜情结之中,但“我”后来逐渐变成一个庸人、俗物,油腔滑调,脏话连篇,好吃懒做,不思进取,没有激情,没有理想,已初显顽主面目;而此时阿眉已不能自拔。这是一段注定没有好结果的爱情,因为男女主人公实在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运动轨道,发生于他们之间的爱情只是一种瞬间的“相切”。小说通过阿眉的遇难完成了这瞬间的美丽,又通过“我”对阿眉的寻访和回忆将“情”渲染到极致。因此一般的读者都将它视作最纯情的爱情小说,而忘记了男主角的品性实难与纯情相联系,忽视了作者在这儿实际上是把爱情和爱情的理想主义推入被批判和嘲弄的窘境了。

如果说《空中小姐》嘲弄了纯情之爱,那么《浮出海面》则演绎了一段抽去了任何意义的潇洒之爱:男女主人公石岷和于晶都脱去了文化传统加之于爱情的种种枷锁,如激情、投入、执著、趋就等,他们的爱情进入一种无所负担、无拘无碍的状态。

他们相约“不陷进愚蠢的爱情中去”,因为爱

* 收稿日期:2003-10-12

作者简介:柳应明(1969-),男,江苏东台市人,盐城工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工
万方数据

就是“被各种糟人沾污得一塌糊涂、无数丑行借其名大行其道的那个字眼。一万个人说这个字一万个人是假招的。”因此他们的爱不太动感情,即使进入热恋状态,也并不疯狂,不失去理智。于晶问石岙:“我可以为你而死,你能吗?”石岙正经地回答:“不能!”他们坠入爱河,但并不爱得死去活来。他们陷进去,也拔得出来。石岙热恋时也能说“不”,失恋时只是到海滨冲刷一下郁闷,没有寻死觅活。于晶也反复申明过自己的态度:“我说过,你要对我说‘拜拜’,我就对你说OK。”他们爱得自然,不逢迎,不献媚,不刻意求成,一切听命于自然的安排,不以成功而喜,不以失败而悲。他们的爱又是生活型的,不关事业理想,不涉国家政治。于晶对石岙说:“我喜欢你是因为你和我在一起可以不谈人生大道理,我感到轻松。”他们的全部爱情内容就是打情逗趣,神聊海侃。在他们看来,爱情并不具有改变人生的巨大力量,只不过是一颗露珠,一滴润滑剂,一撮调味品,使枯燥、乏味的人生变得轻松和有趣一些而已。

这种逍遥游式的自由之爱不可不谓惊世骇俗,不能不令受传统爱情观熏陶的人们瞠目结舌而又怀疑其真。它既是对中国古典超乎生死的至情至爱(如《长恨歌》、《牡丹亭》)的反叛,也是对西方中世纪以来骑士阶层“优雅之爱”的反叛,因而也是对人类爱情一般的反叛。

如果说《空中小姐》写的是失败的爱情,《浮出海面》否定了传统的爱情,那么《过把瘾就死》则消解了爱情的激情和浓度,写了一桩失败的婚姻,再一次颠覆了传统的婚恋观。

《过把瘾就死》中婚姻失败的原因就在于男女双方对于爱情的理解和实践的决不调和。男主人公是一个精神上的斯多噶主义者,无欲无求,澹泊人生。对于男女之间最神圣、最需要严肃对待、最需要激情投入、最需要浪漫幻想的爱情,他竟始终找不到感觉。他曾“爱”过杜梅,但这“爱”仅限于指向外形的美丽,仅限于刹那间的情绪波动,他不敢断言这就是爱情。因此当新婚之夜妻子追问她是否就是 he 从小就想要的那个意中人时,他支吾其辞,总不敢痛快回答,因为他不知道答案:“她是怎么?这我也不知道。”他实在无法确认自己的情感真实。女主人公杜梅则执著于古典爱情理想,寻找着爱的回报。她把爱情看得至高、至圣、至洁,不仅自己全副身心地投入,而且也要对方为之献身,不得敷衍。正如她丈夫所说:“一天到晚就怕

我不爱你,盯贼似的盯着我思想上的一举一动。稍有情绪变化,就疑虑重重,捕风捉影,旁敲侧击,公然发难。”在婚姻破裂,修补无望时,她把丈夫手脚捆上,持刀威逼,非要丈夫说“我爱你”不可。杜梅的这种也许有些反常的行为表现出她对于爱情的热烈、执著和忠贞。而她最后的精神失常则不能不说是作者对古典爱情的一个有意批判。

从上述三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到,王朔实际上嘲弄、否定了爱情上的执著、坚贞、热烈、专一;而他所肯定的潇洒之爱则又与传统爱情观相对立。

王朔的反爱情仅仅是他颠覆的一部分;而在反爱情的背后,实是对社会价值规范的颠覆。

二、个性解放旗号下的反秩序

王朔的反爱情,因为有言情的面具,所以一般人还看不出来。同样,他的那些反法制的小说也被目为法制文学,就是1986年发表的两部中篇:《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和《橡皮人》。从题材上看,前一部写的是昼伏夜出、敲诈勒索的罪犯生活,后一部写的是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的经济犯罪活动。虽然前者的结尾暗示了罪犯的走向新生,后者通过“橡皮人”的非人感觉写出了一种可能的自省。但诚如作者所言:“橡皮人”的感觉是“生贴了进去”的^{[2] p.43}),而罪犯张明的弃暗投明也不过是作者硬性安插的一条光明尾巴而已。因此这两部小说从根本上说是反法制文学,即向社会秩序挑战的文学。

两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些犯罪分子和个性主义者,他们在法律层面上,进而在道德层面上,在文化层面上向广义的社会秩序冲击。张明与同伙假扮警察,里应外合,专门敲诈外商或港客的钱物,李白玲、张燕生等则坑蒙拐骗,无所不为,是经济秩序的破坏者。吴迪和胡跌则是追求个性自由的极端代表。作为一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吴迪对诚实、正直、善良的同学、男友韩劲的疏离标志着她对常规生活的厌倦,而对“贪财、好色、道德沦丧”的社会流氓张明的趋近则反映了她对作为传统道德破坏者“恶”的向往。她所渴望的不是成名成家,和平幸福,而是在向社会秩序的挑战和撞击中获得刺激和痛快。比起吴迪,胡跌更加大胆、放肆、无所顾忌,因而对既定社会秩序的冲击就更具破坏力。她把来自社会的关心、爱护统统视为必须冲破的樊篱。她控诉:“爸爸妈妈哥哥,老师团干部里弄积极分子,谁都管我。这些人有没

有自己的事？怎么就象专为难为别人才活着似的。我才不管那套呢，……哼，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她要冲破社会加之于她的重重约束，砸碎任何外在于她的价值枷锁。

这些人物显然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否定的，但在王朔笔下，他们活得潇洒、自由，无牵无挂，无拘无束。作者于字里行间不仅没有谴责和鄙夷，反而时时流露出赞许和钦羡，这不能不说是对他们的一种隐性肯定。特别是《橡皮人》，它不仅向有形的社会秩序冲击，还向无形的社会秩序冲击。作品中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正面形象，且故事叙述人“我”放弃了讲述者所应具有的控制与批判，在传统视野中被压迫的“恶”的形象得到空前解放。而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尽管作者让两位少女最终都尝到了苦头，但她们的某种叛逆精神正契合了八十年代的个性解放思潮，也许更为具有逆反心理的少男少女所钟爱。这也是小说得以风行的原因。

我们知道，个性解放是八十年代盛行的一股思潮，当时反映这一思潮的作品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为典型代表。而王朔的小说更进一步，不仅写出了青年的叛逆，而且不无欣赏地写了犯罪。不管作者原来的创作动机如何，我们都由此而想到汉大赋那种“劝百而讽一”的社会效果。

三、由讨厌知识分子走向全面颠覆

王朔曾公开表示对知识分子的厌恶：“我没有念过什么大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象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而且打别人咱也不敢，雷公打豆腐捡软的捏。”^[3]于是王朔在小说中对知识分子，进而对文明、文化、一切传统道德、价值规范竭尽嘲讽之能事。

王朔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正面形象。《顽主》中的赵尧舜故作高深，实则一无所长，《玩的就是心跳》中的语言学家（刘炎的父亲）不断地奸污自己的女儿，《过把瘾就死》中杜梅的父亲学有专长并有特殊贡献，但为了情人而谋杀了自己的妻子。总之，在王朔笔下，知识分子已成为一种传统的虚伪与堕落的象征。

万方数据

《顽主》、《一点正经没有》则嘲弄了文学和作家，曾经为人严肃追求的文学事业被漫画化为一幕幕闹剧。《顽主》中的“三T”公司为替文学青年宝康成名，特设“三T”文学奖。授奖大会上，台上是伪劣作家和假冒政府官员，台下是奔免费饮料和舞台而来的男男女女，奖品则是副食店废弃的咸菜坛子。小说将严肃的内容化为荒诞的形式，用表与里、内与外、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暴露人对精神价值追求的毫无意义。《一点正经没有》则把对文学的否定性评价发展为小说的核心主题，文学遭到轻慢和亵渎，文学事业被当成“一点正经没有”的玩闹。王朔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出的对文学的理解是：“文学就是排泄，排泄痛苦委屈什么的，通过此等副性交的形式寻求快感……”而“小说”就是“小人书说的”，或“小说就是名家可以天马行空，新人必须遵循规则的一种文字游戏。”他还把作家视作别无选择的下贱职业，所有的污言秽词都被用来描写和形容作家：“闲散人员”、“会编瞎话的”、“倒霉的差使”……等等。当然，王朔对文学的否定并不仅仅限于文学和文学职业，而是扩大到文学对社会的责任，文学对生活的真诚，文学之内或之外的一切严肃追求。

进而，王朔否定了一切价值规范。在他自认为“最深沉”的《我是你爸爸》里，他把一贯神圣的父道调侃得尊严扫地。马林生为了做一个好父亲，从专制走向民主，甚至不惜与儿子哥儿们相称，但无论如何，马锐对父亲的蔑视、简慢、冷嘲热讽都是始终一贯的，马林生的父道尊严最终走向瓦解。更为严重的是，马氏父子之间神圣的人伦关系也被王朔扫荡净尽。他认为马锐的出生纯粹是“缘于一次小小纰漏（指避孕失败——笔者注），马林生”完全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当了这个孩子的爸爸，就像过去被旧军队拉了伕的良民。”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偶然甚至错误的父子关系，当然也就没有任何神圣性可言了。

王朔参与创作的电视剧《渴望》一直被看做是一部弘扬传统美德的教科书，但细究之，它其实是对传统美德乃至现实生活的嘲讽和亵渎。剧作一方面在“好人一生平安”的旋律中借刘慧芳、宋大成的美德迫使公众认同，另一方面却一再让好人落难：刘慧芳卧床、宋大成绝嗣。这样，好人不再平安，唯一真实的就是现实对“好人”的残酷无情和人对生活的无可奈何。在其续篇、由王朔独立创作的中篇小说《刘慧芳》中，作者继续了这种嘲

讽。小说中的刘依然占有传统的一切美德，小说开始，她像防范流氓一样防范灭火专家夏顺开，继而又声色俱厉地拒绝夏的求婚，而最后当她决定嫁给夏时，夏却飘然远逝了，刘终于一无所有。这样，刘的美德似乎再也不是优点，而成了丧失幸福的主要缘由。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王朔通过他的作品颠覆了一切，这不是一般的否定，不是一般的恢谐、调侃或幽默，而是一种“怀疑一切、摒弃一切、扫荡一切的轰轰烈烈的大嘲谑”，是一种反文化反文明的嘲谑。顽主们无所不嘲：崇高、理性、社会、人生、道德、伦理、历史、政治、性……以及一切禁锢人性装饰禁欲理想主义的东西，一切理性文明所造就的等级秩序。^{⑥4]}

四、颠覆之后：问题、出路及其它

王朔式的颠覆是彻底的，但接下来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这种颠覆有何意义？王朔何以要如此颠覆？支持这种颠覆的力量是什么？颠覆之后的“顽主”们又向何处去？王朔作品的价值究竟何在？

我们知道，对传统价值规范的颠覆并非始自王朔，而是始自具有强烈现代主义倾向的刘索拉和徐星，但王朔将这种颠覆发展到极致并赢得了众多读者，则不能不令人深思。不错，王朔的颠覆曾令许多人不快，甚至义愤填膺；八、九十年代之交还被一些报纸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之一。但我们细想一想，难道王朔的颠覆真的毫无道理吗？难道我们的爱情真的那么纯洁、高尚？我们的社会秩序、价值规范真的那么完美无缺？如果对上述问题我们不能作一个肯定回答，那么王朔的颠覆至少有一定的警世意义，它使我们想起了：多少以金钱、地位为筹码的爱情，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特权阶层，知识分子的空疏、无能……对于王朔何以要如此颠覆的问题，不少论者从王朔的个人经历、文化修养等方面来探讨个中缘由。如蔡翔就说：“王朔的小说表现了一些没落的‘贵族’子弟如何因为政治幻境的破坏而转向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商业文化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精神背景，他们的失意、痛苦、彷徨、茫然构成了一种对整个传统秩序和文化的痞子式的颠覆力量。”^{⑥5]} P.388）他们对社会的破坏，怀有一种明显的功利目的，便是跻身新的经济秩序之中（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深刻，那么具有后现代性）。^{⑥5]} P.375）

就连那位“后现代”论者李之鼎也不得不承认：“嘲谑虚无主义既是一种生存—游戏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策略和人生策略。他们试着以此在生活中寻找自己理想的位置，脱离那不堪忍受的边缘状态和抛掉自己也瞧不起的边缘人身份，乃至跻身于中心。”^{⑥6]}这就是说王朔的颠覆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而否定主义批评家吴炫评价中国现代主义的那一段话，我以为用来说明王朔颠覆的原因似乎更为恰当。吴炫说：“中国的现代主义者们的玩世不恭是表面的，如果他们能实现个性的价值，他们决不会玩世不恭。……他们的一切无目标性，冷漠性，感官享乐性，几乎都来自于他们的目的没有实现所生成的苦闷。但是为了维护已经意识到的自尊，他们不得不以嘻嘻哈哈的方式来控制眼眶深处的泪水，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自身所处的文化流露出来。”^{⑥7]} P.185）具体到王朔，他则说：“我愿意将王朔这种做法首先理解为是中国人构建自己的意义无能的结果。于是，在对未来的彻底消解中，王朔也解除了因这种无能带来的沉重、羞愧、自卑的心理负担，从而显得轻松乃至自得起来，并且也因此迎合了大多数中国人因物质贫困和精神构建的劳累而转化的对生存快乐的第一性需求。”^{⑥7]} P.204—205）王朔之所以被中国不少读者看好，又被少数评论家牵强地冠之以“后现代”，这既与中国传统的生存快乐原则有关，也与中国的老庄式的消解有关。^{⑥7]} P.205）因此，王朔颠覆的支撑性力量还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而非什么西方的后现代。道家的“一生死”、“齐是非”、“无可无不可”、“身与物化”，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禅宗的“顿悟本心”、“直用直行”等等，铸就了中国文人的“狂”、“狷”之气……诸如刘伶的病酒裸身、李白的戏君捉月、徐渭的击首椎耳……绵延千百年而不绝。王朔不过是以小说的形式将中国文化的这一面展示出来，而且发挥到极致。

王朔的顽主们是无所依傍地、一无肯定地进行颠覆的，因此初一看来，颠覆之后的世界便是虚无（爱情、秩序、价值、规范、理想、崇高……一切都没有了。这倒契合了那一股国际性潮流——后现代主义，评论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来阐释王朔创作的后现代性的。但是，且慢，王朔及其顽主们的头脑中并非一片空白。同样是这位“后现代”论者李之鼎也说，从他们身上“可以发现浓厚的传统意识。……（他们）大都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知晓一

些中西文化知识,并且关心古今中外社会大势,有的还从事或开始从事写作。^[6]他们骨子里并未完全看破红尘、一切虚无。^[6]这正是顽主们与西方现代艺术中“荒诞人”、“空心人”的区别。在顽主们看来,人生的价值就在生活本身,因此他们能过得有滋有味,人与人之间也不乏温情。这也许是不少评论者把王朔称为“新写实”而不是“后现代”的原因。

但顽主们的知识背景、文化教养又决定了他们在颠覆了旧的之后无法构建任何新的规范、体系,因此颠覆之后的顽主们最终只能重归传统。于是我们看到,王朔作品中人物的反叛最终都失败了。无论他们怎样渴望引起社会的注意、理解和应有的尊重,也无论他们怎样以轻松、幽默、滑稽的姿态出现,千百年来积淀在人们心理上的传

统文化定势所形成的种种阻力使他们很难如愿以偿,他们无力拯救自己,只能从亵渎人生的激流中退下来,慨叹着人生的无奈。《你不是一个俗人》中支撑着“三好”协会的于观最终想冷静下来,方言(《给我顶住》)则“像一个刚越狱的囚犯没跑几步又被抓回去”,胡亦(《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随着回程的开始又回到了熟悉的旧世界,马林生(《我是你爸爸》)想方设法要使儿子幸福,最终却不得不重回“专制”。……他们在一种文化传统中产生了反抗的欲望,可是反抗一开始,他们却发现必须回复到原有的秩序中去,由反传统到重归于传统,踏上疲惫的归程,生活又陷入了死寂状态——而对这种荒诞的人生状况的思考,也许才是王朔作品的最大价值。

参考文献:

- [1] 邓晓芒.王朔与中国文化[J].开放时代,1996(1):22-26.
- [2] 王朔.我是王朔[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
- [3] 王朔.王朔自白[J].文艺争鸣,1993(1):55-66.
- [4] 李之鼎.王朔创作的后现代性阐释(上)[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综合版),1994(1):6-12.
- [5] 蔡翔.旧时王谢堂前燕[A].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 [6] 李之鼎.王朔创作的后现代性阐释(下)[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综合版),1994(2):6-9.
- [7] 吴炫.中国当代文学批判[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Subverting and after Subverting

——On WangShuo's Novels again

LIU Ying-ming

(Department of Humanity Science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03, China)

Abstract :WangShuo's novels were famous of their subverting. They subverted love order and all traditional value norm. This Subverting had it's value in a certain sense. But WangShuo's subverting had still depend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ruffianly culture, so ruffians had to surrender to tradition at last. The thinking about the absurd life states is the highest value of WangShuo's novels.

Keywords :WangShuo's novels; subverting; subvert love; subvert order; return to tradition